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书库
WEIJIN XUANXUE JIYIDAI RUSHI DE JIAZHI QUXIANG

冯祖贻 著

魏晋玄学

及一代儒士的价值取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WEIJIN XUANXUE
JI YIDAI RUSHI DE
JIAZHI QUXIANG

B235. 05
09

◎ 冯祖贻 著

魏晋玄学

及一代儒士的价值取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魏晋玄学及一代儒士的价值取向/冯祖贻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660 - 0587 - 8

I. ①魏… II. ①冯… III. ①玄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②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B235. 05②D691.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206 号

魏晋玄学及一代儒士的价值取向

著 者 冯祖贻

责任编辑 徐桂红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9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587 - 8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言：玄学之“玄”

玄学是什么？要从“玄”字的本意说起。玄，有其色黝然、不可分别、测知，极为深远之意。先秦《老子》第一章，便以“玄”来解释“有”、“无”之间的哲学意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因此，探求宇宙万物的本体（如“有无”、“本末”、“体用”、“名教与自然”等）关系的学问，便叫玄学。玄学的特质就是研究的对象是幽深的、似不可及的道理，所以它是“玄之又玄”的，然而却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是“众妙之门”。

玄学与过去的哲学不同，魏晋之前，探求宇宙构成是从物理学入手的，如天、地、气等，玄学不然，正如汤用彤先生说：“及至魏晋乃常能弃物理之寻求，进而为本体之体会”，这个本体就是“无”，认为万物都是从无开始的，有生于无。玄学不执著实物，凡阴阳五行及象数之谈，均废置不用，完全是一种纯玄学之讨论。汤先生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可谓一语中的。

玄学既是讲求本末有无的，将之简单地归之于传统的儒家或道家范畴便失偏颇；从思想史角度，将玄学称之为中古时中国特有的思想流派或哲学思潮，或比较恰当。

玄学讲本末有无，最适合的谈资便是儒家重要典籍《易经》，因为《易经》是玄远、深邃的学问。《老子》则因为“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裴頠：《崇有论》）；《庄子》则因为它“知本”，即知“道”（郭象：《庄子注·序》），都符合玄学的宗旨，所以玄学家们常将《周易》、《老子》、《庄子》合称“三玄”，是清谈家讲玄学最重要的资料。

有的学者因玄学家谈资中有《老子》、《庄子》，便将玄学归之于道家，这并不妥当。以玄学开创者何晏、王弼为例，王、何虽引述老、庄，但何却写了《论语集解》，王写了《周易注》，前者“集诸家训诂之善者，义有不妥，辄改易之”，立论极为平实；后者则用老、庄来解释《周易》，摒弃了汉代经学五天帝主宰的神秘宇宙观，两人都称得上儒学功臣，所以钱穆先生称何、王的玄学为“魏晋时的新儒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之《魏晋玄

学与南渡清谈》),是有道理的。即便到阮籍、嵇康时期,老庄地位抬高,嵇康还说过“非汤武而薄周孔”之类的话,但他们并非一味反名教,他们反对的是伪名教,并未越出儒家范围。玄学发展到向秀、郭象时,向提出“以儒道为一”,郭讲“名教即自然”,明显是调和儒、道,力纠之前玄学分割名教与自然的倾向,这是玄学一大转机。到东晋,一方面玄学承正始、元康余风在发展,南朝宋时,玄学还被官方列为“四学”(即儒、玄、史、文)之一,但儒学也在作自我调整,“缘情制礼”、“情礼俱到”成为世风,玄学家深通礼制,礼学家兼注“三玄”为社会惯见,于是出现了大量礼玄双修、玄礼合流的人物,儒学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对魏晋玄学发展进程的回顾,不难看出,从儒、道两家的升降起伏来观察玄学,玄学不过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道家在其间流行且地位抬升,但最终还是汇入儒家洪流之中。由于以道释儒的结果,原来儒家思想反倒更加丰富了。上述何晏著《论语集解》、王弼著《周易注》都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为后世儒家尊崇,就是明证。

玄学流行于世时,正值佛教进入中国后获得发展时期,这一现象被后人误解,认为玄学正彷徨时,佛教便成了玄学的归宿。梁启超的《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便持有这一看法。梁氏说:魏晋之间“易老”之学大昌,王弼、何晏辈是最著名的代表,而当“正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于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之归壑,固其所也。”经研究,此说并无根据。正确的看法是:“玄学是从中华固有学术自然的演进,从过去思想中随时演出‘新义’,渐成系统,玄学与印度佛教在理论上没有必然联系,易言之,佛教非玄学生长之正因。反之,佛教倒是先受玄学洗礼,这种外来的思想才能为我国人士所接受……所以从一方面讲,魏晋时代的佛学也可以说是玄学。而佛学对于玄学为推波助澜的助因是不可抹杀的。”(汤用彤:《魏晋思想的发展》)

玄学兴盛时,源起于东汉末年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在发展。佛、道两教在这时发展的历史根源,在于汉末至魏晋,战乱频仍,人民生命朝不保夕,宗教为之提供了精神庇护。道教与道家名称虽同为“道”,实质不同,道家是思想流派,道教是宗教。道教不过是借用了《老子》、《庄子》作理论基础,(在道教那里一称《道德真经》;一称《法华真经》),并将之奉之为教主、真人。此时道教因初创,便大量因袭佛教经文,而佛教经文,特别是传到中国后,玄学化的僧侣们的佛经讲义早就不是印度原义了,加以此时道士们诵读

的《道德经》、《法华经》最著名的注家便是王弼、向秀、郭象等玄学大师，那时佛教僧侣与道士都能谈玄，成为东晋、南朝朝野奇观。

一个时代的代表思想，往往是那个时代统治者的思想。魏晋南北朝的统治阶级是门阀世族，玄学便打上了门阀世族的烙印，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玄学还与这时发达的庄园经济有关系，玄学家们终日高谈玄理，寄情山水，既有钱，又有闲，如若不是大大小小的庄园主，如何能过这样优游自在的生活？这同样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魏晋玄学的总体评价上，曾有过过度政治化的倾向；那么今天我们谈魏晋玄学时，也不应忽略这些事实吧。

目 录

一、魏晋玄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1)
(一) 纷乱的年代与名教危机	(1)
1. 纷乱的年代	(1)
2. 名教危机和儒学地位的下降	(5)
3. 诸子学兴盛与道家抬头	(10)
(二) 儒士的人格觉醒	(12)
1. 党锢之祸和儒士的集体觉醒	(12)
2. 儒士的个人觉醒	(14)
3. 儒学从繁琐到简约	(15)
(三) 从清议到清谈	(16)
1. 东汉的征辟察举和清议	(16)
2. 魏晋玄学的雏形——刘劭的《人物志》	(19)
3. 清谈的出现及其内容、形式	(20)
二、魏晋玄学的四个时期	(24)
(一) 正始玄学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	(24)
1. 何晏的“无名论”	(24)
2. 王弼的“以无为本”——名教出于自然	(25)
3. 正始名士与正始玄风	(27)
(二) 竹林玄学与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29)
1. 嵇康、阮籍的自然本体论与对伪名教的揭露	(29)
2. 嵇康、阮籍对生命的感悟和思想矛盾	(31)
3. 向秀的“以儒道为一”	(33)
4. 竹林清音与竹林七贤的政治分化	(34)
(三) 元康玄学与裴頠的“崇有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及郭象的 “独化”论	(36)
1. 裴頠的“崇有论”	(37)

2.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38)
3. 郭象的“独化”论与名教即自然	(38)
4. 元康放达之风及“将无同”出现	(40)
(四) 东晋、南朝的玄学与儒、佛、道的关系	(42)
1. 帝王将相亦向玄	(43)
2. 佛教的玄学化	(45)
3. 道教教理与玄学的相通	(46)
4. 儒学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48)
 三、魏晋玄学与一代儒士的价值取向	(51)
(一) 以隐逸、清高相标榜的社会风气	(51)
1. 世务为耻, 玄言为高	(51)
2. 重名轻实, 以文为上	(53)
3. 清简宽仁, 反对猛政	(55)
4. 远离政治的高人、逸士们	(57)
(二) 以自然、真情为高的精神追求	(59)
1. 反对虚伪, 热爱自然	(59)
2. 个性的张扬	(62)
3. 对真情的歌颂	(64)
4. 闺阁中的真情与女性的解放	(66)
(三) 宽人严己的道德风貌	(67)
1. 新的道德典范确立	(68)
2. 虚己待人的风度	(70)
3. 道德的家族传承	(71)
4. 自我努力与改过自新	(72)
(四) 新的美学观及其在文学、艺术上的贡献	(73)
1. 以个体感受代替社会感受的美学标准	(73)
2. 文学上的成就及文论的繁荣	(75)
3. 书法上的成就及书论涌现	(77)
4. 绘画上的成就及别开生面的画论	(78)
(五) 走向反面	(79)
1. 贪鄙与吝嗇	(79)

2. 服食与鬼神信奉	(81)
3. 对奴隶、依附民的剥削——玄士闲适生活来源	(82)
4. 从至虚、顺性到肆情放荡——魏晋玄学的终结	(87)
四、玄学向佛学的转向	(91)
(一) 道安、慧远的早期般若学	(91)
1. 道安与“格义”	(91)
2. 六家七宗	(92)
3. 道安、慧远的般若学	(94)
(二) 鸠摩罗什、僧肇的大乘空论	(97)
1. 鸠摩罗什的“中观”空论思想	(97)
2. 僧肇的《肇论》	(98)
3. 是佛似玄的大乘空论	(101)
(三) 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说	(104)
1.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提出	(105)
2. 顿悟说	(106)
3. 从本体论到心性论	(107)
(四) 向佛的儒士	(109)
1. 儒士向佛的多种表现	(109)
2. 谢灵运的《辨宗论》	(112)
3.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归心篇》	(114)
尾声：简释“清谈误国”	(117)
附 录	(119)
(一) 东汉末各帝姓名、年号（只标元年）表	(119)
(二) 三国各帝姓名、年号（只标元年）表	(120)
(三) 两晋、宋、齐、梁、陈各帝姓名、年号（只标元年）表	(121)
后 记	(125)

一、魏晋玄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个时代某种思潮的兴起并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必然是这股思潮适应了时代需要，回答了这个时代提出的众多问题。魏晋玄学从勃兴、发展到成为魏晋至南朝的主导思想，也经历了这一过程。这个过程时间跨度很大，它的起点应上溯至东汉末年。

（一）纷乱的年代与名教危机

魏晋玄学诞生于曹魏，到西晋，得到长足发展，流风余韵，延至东晋与南朝。它的兴盛与发展，与那个特殊的纷乱年代和传统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产生严重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纷乱的年代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东汉王朝，到桓帝（147—167 年在位）、灵帝（168—189 年在位）时，已内外交困，千疮百孔。统治阶级内部宦官与外戚交相专权，朝政混乱不堪；东汉是依靠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才在镇压了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后得以建立的，因此地方豪强与中央政权既相互勾结又矛盾的总趋势延绵不断；封建国家、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又将获取财富的矛头指向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大量流亡，桓帝永兴元年（153）黄河流域遇到大灾荒，“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后汉书·桓帝纪》）此类记载史不绝书，终于激起了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这次大起义，从灵帝永平元年（184）爆发，到献帝初平三年（193）才被曹操等地方豪强镇压下去，但余部仍抗争不断，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还有黄巾军在山东杀济南王刘赞的记载。（《后汉书·献帝纪》）东汉王朝终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走向衰微。

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各地豪强和地方牧守势力得到壮大，他们不仅攻打黄巾军，也相互争战，扩充势力，正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征引《典论·自叙》中说的：“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山东大

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当时形成以董卓为首的关西豪族集团和以袁绍、袁术、曹操、公孙瓒、孙策等为代表的关东豪族集团两大派。当时刘备虽属关东集团，但还是小角色，依附于公孙瓒。斗争结果，董卓大败，但随即关东集团分裂，变成了曹操与袁氏兄弟的斗争。经官渡之战（200）曹操大胜，基本统一北方。其间刘备曾一度依附曹操，脱身曹营后赴荆州依刘表，孙策之弟孙权也在江东雄据一方。曹操欲统一全国，就需对荆州、江东用兵。适刘表死，次子刘琮以荆州降曹操，刘备乃东下与刘表长子刘琦联兵，又派诸葛亮出使江东，说动孙权联兵抗曹，曹操的二十余万大军与刘孙联军（共五万余）在208年发生了有名的“赤壁之战”，曹军败，奠定了三国分治的局面。220年，曹操子曹丕废汉献帝建立魏，定都洛阳；221年，刘备在四川称帝，史称蜀汉；223年，孙权在江东称帝，国号吴。

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统治者都采取了相应措施，维持了各自在国内的统治，但仍相互争战不已。论领土、国力，三国中魏最强大，但内部最不稳定，因为它继承的是东汉以来的局面。作为统治者，魏的曹操、曹丕、曹叅三代统治者都不得不考虑：东汉原来以儒为本的名教之治是否还能继续维系统治？如已不能，那么是否要从儒家以外寻找统治者所需要的理论？事实已经证明，原来按照名教的要求，选官择吏的一套制度已失去效能，选出的反倒是贪污无能、盗窃虚声之辈，他们不仅不能帮助统治者统驭民众，反倒激化了原来的矛盾，那么，应该如何用新的一套标准制度识别任用统治者需要的人才？明白了曹魏统治者的迫切需要，我们便可知玄学为什么从刑名学的流行开始，又为什么由识别人才的《人物志》首发其端了。

曹魏后期，政权已落入世家豪族司马氏手中。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逼曹魏最后一个君主陈留王曹奂禅位，西晋取代曹魏。280年，西晋大举攻入建业，吴主孙皓出降，西晋统一了全国。

西晋是个代表豪门世族的政权，它继续推行魏的九品中正制，保证世族能执握政权；更颁布占田制和荫佃客制、荫衣食客制，规定按官员品级高下占有田地，免除所荫佃客、衣食客税赋，其结果是让封建庄园获得更大发展；鉴于曹魏时皇族“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侔于匹夫”，（《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无法屏护中央政权，恢复了分封制，时司马氏宗亲共封了五百余国，大国食邑有达10万户的，并领有军队。西晋统治者上到宣帝下到王公官僚，生活都极端奢侈腐化，晋武帝司马炎就公开卖官鬻爵，有人称比东汉桓

帝、灵帝还不如（《晋书·刘毅传》）终因统治者争权夺利，先从晋皇室内部外戚杨氏（武帝皇后）、贾氏（惠帝皇后）专权开始，酿成了有名的“八王之乱”。八王中有惠帝的三个弟弟、一个堂兄弟、两个叔祖（司马昭的弟弟）、两个司马懿弟弟的后代（惠帝的堂叔辈）。“八王之乱”从291年贾后杀杨氏外戚开始，到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攻入洛阳，杀惠帝另立怀帝止，前后16年。“八王之乱”时，各诸侯王为壮大自己的力量，还引入了边疆的少数民族首领参与战争，造成了更大的动乱。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族刘聪攻入洛阳，俘虏晋怀帝；316年，刘聪派遣刘曜攻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灭亡。

西晋的统治虽只有短短的三十余年，而且动乱不已，但在武帝、惠帝初年却有一段暂时的平静，史称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晋书·食货志》）由分治走向统一，南北的经济、文化得到交流，也有利于此时玄学的发展。

司马氏宣称以孝治天下，是尊崇儒学的，但对宣传道家思想的玄学并不反感，这是因为玄学已成为士族特有的思想，是士族的标志，西晋统治者为了消除曹魏影响，争取士族拥护，特别优厚士族，尤其是高级士族，所以司马师本人也曾参加过玄学活动，一些玄学名士犯了法还特加优容，只要不是曹魏一党的。玄学中蔑视礼法、纵情无度的宣传，也为西晋贵族官僚荒淫无耻生活找到了依据。这也是西晋时元康玄学全盛极一时，“中朝名士”们放达之风欣羨朝野，著名的玄士如乐广、王衍等能位列三公的原因所在。

学界普遍认为，魏晋玄学历经曹魏时的正始玄学，由何晏、王弼首创“贵无”；历竹林玄学，嵇康、阮籍将名教与自然之间矛盾推到绝对；继之裴頠主“崇有”，与“贵无”相颉颃；再到向秀、郭象，一主“以儒道为一”，一主“独化”倡名教即自然，正如哲学上的合——分——合的过程，从思辨学角度已完成了它的全过程，玄学到郭象，业已将名教与自然这组矛盾圆融地解决了，玄学也到此为止了。东晋、南朝的玄学也只是与佛教融通问题了。

其实不然，从史实上考量，玄学因能符合东晋、南朝统治者需要，仍在发挥它的作用。

317年，西晋一个疏远皇族司马睿在北方士族王导等簇拥下，东渡江南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东晋建立的首要任务是将局面稳定下来，招抚流亡，安定人心，发展生产。名教与自然相统一，儒道合一的思想是最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史载王导曾对元帝司马睿说了四句话：“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其结果是“江东归心焉”。（《资治通鉴·晋纪8》）而

“谦”、“俭”、“清静”正是玄学所主张的，王导本人热衷清谈，是东晋初年清谈的领军人物。

继王导而起的清谈领袖是谢安，同时也是东晋中期有名的宰辅，他完全承继了王导的治国方略，他一方平定政权内部军阀豪族的夺权阴谋（平桓温），一方又指导了有名的“淝水之战”（383），并取得胜利。这又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其对延续东晋王朝乃至以后南朝在江南统治都起了重要作用。谢安的内、外两手都在面不改色，“镇之以静”的情况下完成的。谢安本人更是有着高度修养的玄谈之士。

玄学既在安内、攘外上发挥着如此作用，所以东晋、南朝各代帝王均好玄；刘宋时，玄学还与儒、史、文三学并称为官府承认的“四学”之一。

东晋、南朝时的玄学还有一个特点，因为自郭象以后，玄学从理论上讲已鲜少有新的发展，如王导的清谈，“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世说新语·文学》）“声无哀乐”和“养生”，源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言尽意”出于欧阳建的《言尽意论》。题目是老题目；不过“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只是在深度上下了工夫。此时的玄学还因佛教的流行，高僧的参与，玄佛两家融和，稍有不同而已。此时玄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主要体现在玄学深入士子心灵上。因为门阀世族控制选人入仕的途径，所谓“甲族（世族）以二十登仕，后门（寒族）以过立（三十以上）试吏”（《梁书·高祖纪》），下级士族在入仕困难情况下，只能在文化修养上下工夫，寄情山水，追求精神上的解放，这些影响了上层士族。于是玄虚之风倾动朝野，这也是东晋南朝诗歌、书法、绘画都取得辉煌成绩的原因。

东晋、南朝的玄虚之风，影响了社会习俗和风气，统治者要么重文轻武、不务正事，要么奢侈淫乐，就南北总体形势论，政治、军事上北方已远胜南方。

那么玄学难道没有影响此方？有，但很微弱。原因有三：

第一，北方战乱不断。西晋灭亡后，北方即陷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建立的十六国混战中。十六个政权，有五凉（前、后、南、西、北）、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夏及成汉（在巴蜀），只有苻坚领导的前秦曾短期统一北方。其余时间都在分裂和彼此征战中渡过。直到366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才又统一北方，但不久又分裂成东魏（534—550）、西魏（534—556）；东魏被北齐（550—577）取代，西魏被北周

(557—581) 取代；后北周灭北齐，北周又被权臣杨坚取代，称隋。隋文帝杨坚大业九年（589）灭陈，中国才恢复了统一。北方的战乱，与南方相对安定恰是一个对比，玄学在北方没有它应有的存在与发展的环境。

第二，西晋末年战乱中，士族大量死亡，又有大批士族南迁，玄学也随之南移，因此北方缺少了玄学存在的阶级基础。士族大量死亡中，以怀帝永嘉四年（310）最为惨重，那次著名清谈家王衍率洛阳士卒 10 余万奉东海王司马越之柩还东海，到苦县宁平，被石勒军围而射之，无一人得免。王衍本人也被石勒推墙压死，10 万人中不少是士族高官。南渡士族，最初有百家，所以东晋有《百家谱》，此外没有追随司马睿，自己分别南渡的士族亦复有不少。

第三，北方少数民族首领执掌政权后，为了维持对广大汉族居住区的统治，也拉拢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主要是遵守礼法的儒学世家如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等，在北魏时被定为“清修之门”。南方士大夫因内部矛盾而北逃的，一到北方也是劝北方统治者兴礼乐，几乎没有记载有劝统治者兴清谈的，可见北方统治者喜欢的还是传统儒学。

南朝晚年玄学无论从其理论上或功能上都已走向式微之路，此时不仅玄儒合流已成必然之势；走向中国化的佛教，经僧肇的“三论”、到竺道生的“大顿悟”说，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传播上都契合了统治者和民众的需求。殆隋灭陈，北方统一南方，玄学便退出历史舞台，除儒学而外，巍峨的隋唐佛学便成为一代显学。

2. 名教危机和儒学地位的下降

名教危机和儒学地位下降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名教危机是造成儒学地位下降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儒学本身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统治者已不再视之维持其统治所必需，才是儒学衰微更重要的原因。

什么是名教？陈寅恪先生这样说：

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陈先生在这里明指名教与自然这一对概念的对立，对理解魏晋玄学有极大裨益。不过，稍狭窄了些；后来余英时先生扩大了范围，说：“事实上魏晋所谓‘名教’乃泛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他指出当时由于豪族门第势力扩大，“父子之伦（即家族秩序）在理论上尤超乎君臣之伦（即政治秩序）之上，成为基础的基础了。”（《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传统的名教中置第一的便是君臣之伦。儒家最重君臣之义，所谓“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二”，君主代表着天，皇帝是天子，臣民要共同拥戴他，故不能怀有贰心。然而到了汉末魏晋之际，君臣这个不二之伦便打破了，首先是老百姓不承认荒淫无耻的君主是自己拥戴的君主。余英时曾引《后汉书·逸民传》中一个故事来证实。有一汉阴老父，当桓帝出游时，百姓莫不去观看，这个汉阴老父“独耕不辍”竟不管理，有个尚书郎张温感到很奇怪，便去问老父。老父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
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
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

这位汉阴老父首先讲了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由于天下乱，应理而立，又讲古之圣王的优秀品格，再谈及当下天子之失德，最后反问张温：这样的天子，难道还要大家去欢迎他吗？汉阴老父明指桓帝为“今子之君”，而非天下人之君，其对无道君王之否定是一目了然的。

这尚且来自百姓口中，在上层统治者那里，君臣之道早就丢在脑后。曹操在汉末群雄争霸之时，迎汉献帝，不过是“挟天子而令诸侯”，汉献帝不过是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傀儡，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就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称曹操“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他生前没有篡汉而自立，不是不想，而是一种“自抑”（《资治通鉴》汉纪60），待到他儿子曹丕时，也不用自抑了，直接让汉献帝“禅让”。

距曹丕篡汉后40余年，同样的故事再度上演，不过主角换成了司马炎。司马炎祖父司马懿在魏明帝曹叡时已掌大权，明帝临死又任为辅命大臣辅助齐王曹芳。正始十年（249）司马懿阴谋发动“高平陵事件”，除去曹氏另一辅命大臣曹爽及其同党（内中不少为玄学之士），实际控制了曹魏。司马懿

死，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继续铲除曹氏势力，清除朝中曹魏余党（如李丰、夏侯玄）废齐王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又打败镇守外地的亲曹势力（如毋丘俭、诸葛诞等）司马师病死，此时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了。（《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司马昭不放心这个小皇帝，于是在贾充策划下，成济、成倅兄弟在众目睽睽之下竟将曹髦杀死。司马昭假装痛心不已，将成氏兄弟处死。曹髦死，司马昭又立了一个傀儡陈留王奂。不过司马昭也死了，死在他儿子司马炎手上，终于在洛阳又上演了一幕禅位好戏，晋朝成立。

司马氏代魏过程比之曹操、曹丕父子代汉更为残酷，杀的人更多，以致东晋明帝听到王导讲起这段故事后，低头拍床叹道：“若如公言，祚安得长！”（《晋书·明帝纪》，又见《世说新语·尤悔》）的确西晋只有短短三十几年的寿命。

以上曹魏代汉和司马氏代曹的历史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这不能不给生活在汉末、魏晋时的士人们以强大的震撼。嵇康、阮籍为何对圣君、贤上如此蔑视，应当说是有缘由的。

名教中第二伦便是父子之伦。东汉时，父子之伦有压过君臣之伦的趋势。如袁宏讲过：“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辨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后汉纪》卷26）明指父子象征天地，君臣则仿效父子，如是天地、父子、君臣依次排序，是东汉末年某些儒士们内心的想法。父子一伦地位抬高与东汉以后宗族势力扩大有关。依据亲族血缘为纽带，以直系的父、长子、长孙为大宗，其余次子为小宗，小宗则绝对服从大宗，大小宗之间则讲究亲亲，形成宗族间亲密不疏的关系，因此中国传统的伦理除重忠外，便是重孝，再下才是仁、义。

尽管上层统治者提倡孝，而且将孝作为选拔官吏的条件，但这时的孝已经变质。《后汉书·陈蕃传》记下了陈蕃亲自经历过的事。陈蕃当青州太守时有民赵宣，在父母亲葬后，居住在墓道中守孝20余年，周近人们无不称其孝。陈蕃后找到赵宣妻子，才发现赵宣妻子有五个儿子，都是在守孝期间生的。这自然是一种“伪丧”。此种伪孝、伪丧极多，直至南朝，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也记下一个例子，有一人在守孝时故意用巴豆涂脸，让脸上长满疮，表示哀痛已达极点，颜之推称之“伪丧”。

在统治者那里，孝悌不过是一块遮羞布。曹丕称帝后，为防止他的弟弟篡夺帝位，是不择手段的，他的大弟弟曹彰武力过人，多次随曹操征讨乌丸、鲜卑，可说是曹操的有力臂膀。曹丕做皇帝后第四年，将他召回洛阳，不明

不白地“暴薨”。二弟曹植善文辞，特别得到曹操宠爱，为争宠，曹丕多次设计陷害，登基后，仍没有放过曹植，先剪除曹植周围谋士丁仪、丁廙，（杨修已被曹操杀死），“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200人”，而且多减半。封地在12年内三次迁徙，曹植多次上书这位哥哥，恳请能用他，曹丕不是训斥便是假意作答，以至曹植41岁就病死。（参见《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

比之曹丕对弟兄的薄情，司马氏宗族内的斗争更血腥、更残忍。先是媳妇与婆婆争权，惠帝妻贾后杀惠帝舅舅杨骏，将杨太后（武帝妻）活活饿死；贾后又勾结惠帝之弟楚王司马玮杀辅政的叔祖（司马懿第四子）汝南王司马亮；又借司马玮擅杀亲贵大臣之名，杀司马玮，贾后独掌大权，又不放心，遂杀已立为太子的司马遹（非贾后生）；另一叔祖赵王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发动禁兵杀贾后……一共八个宗室王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之中，母子间、兄弟间、叔侄间、叔祖与侄孙之间都大开杀戒，惠帝最后也被堂叔东海王司马越毒死。亲族之间的亲亲之情、之爱，完全被撕得粉碎，剩下的是血淋淋的权力争夺。

名教还成了司马氏篡夺魏的遮羞布。司马懿本是明帝临死时特授的顾命大臣，命其辅助齐王曹芳。在高平陵事变，司马懿杀另一辅命大臣曹爽后，总觉齐王曹芳碍事，便废齐王曹芳，其理由便是曹芳年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傲滋甚”。在他弟弟司马孚、儿子司马师率群臣给太后所上奏中更举出齐王种种对太后不孝的行为作证。高贵乡公曹髦继位后，因见司马昭专权日甚，自率仆从准备杀司马昭，但终被司马昭亲信贾充命手下将曹髦刺杀，“刃出于背”。作了如此悖逆名教之事，但司马昭以皇太后名义下的诏书竟说曹髦“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又“举弩遥射吾宫，祝当令中吾项”，甚至“密因耽毒”，简直不孝到了极点。此诏书很清楚出于司马昭手下之手。（均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既然儒学名教中，不管是君臣之伦或父子之伦，均被统治者弃如弊履，社会总要继续运行下去，新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此时儒学本身也在走下坡路。

自汉武帝提倡“独尊儒术”以来，两汉一直是儒学的一统天下。但两汉的儒，并不是孔、孟创立的儒学，实际是董仲舒加工过的今文经学。董仲舒将《易经》中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融合起来，讲究天人感应，